

让文学语言

重归生活大地：

论方言写作——以陈忠实为中心

王素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让文学语言

重归生活大地：

论方言写作——以陈忠实为中心



王素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让文学语言重归生活大地:论方言写作:以陈忠实为中心/王素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 - 7 - 5203 - 0978 - 3

I. ①让… II. ①王… III. ①小说创作—文学创作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821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熊 瑞

责任校对 朱妍洁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259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安工业大学专著基金项目资助

颇有见地的方言写作研究

畅广元

《让文学语言重归生活大地：论方言写作——以陈忠实为中心》一书，是王素同志的一部文学论著。我读后不仅从学理上受到启迪，而且被其认真研究的精神所感动。

文学是语言艺术，可我们以往却很少从语言层面去研究一部作品的文学性。王素的这部论著尽管还有其不足之处，但他能以陈忠实的作品为对象，从方言写作的角度探讨其写作策略，揭示其“淘采语言的智慧”。对一位年轻的文学研究者来说，这种创新欲求和钻研精神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赞赏。

王素是把陈忠实的方言写作，置于汉语文学方言写作的历史渊源与发展现状的背景下展开他的研究的，这就使他的思路具有一种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此基础上，他首先清晰地论述了陈忠实的方言写作是怎样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而演变出三个阶段；进而有理有据地说明陈忠实方言写作的动因；最后颇具创意地以“极富弹性的方言”“作为生活语言的方言”和“作为民间语言的方言”，分别论证了陈忠实作品中的“形象化叙述”“生命体验的展示”和“个人视野的民间立场之表达”。这其中最值得人们关注的有两点：一是作者把“更新和改造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需要”作为陈忠实方言写作的重要动因，这是对文学规律有深度理解的见解。陈忠实的文学之路有一个从“革命的

现实主义”转进到“文化批判现实主义”的过程，处于前者的写作状态，既不能不“与强势政治话语周旋”，又不能不接受强势政治话语的表达方式；进入后者的写作状态，为了更强烈、更鲜明地展示作家的生命体验，表达作家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和“个人视野的民间立场”，必然在“多重文化语境交汇中”吸纳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方言，自觉调整和更新其语言表达的结构形态。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文化批判现实主义的要求。二是作者对陈忠实方言写作策略的描述和概括较为准确。为了把作为小说家的陈忠实“淘采语言的智慧”真实地呈现出来，王素通过作家是怎样具体地精选方言来完成其形象化的叙述，表现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坚定的文化批判立场的分析，给读者留下的印象相当深刻。

人们不难发现，在做上述的研究时，王素并不是要把文学语言方言化，因为他恪守的基本学理是：优秀的方言写作的价值在于强化作品独特的审美品性，它扎根于生活的真实，奠基于作家独具的强烈的现实感和深邃的历史感，有赖于作家高尚的艺术人格。

王素师从梁道礼教授，梁教授治学严谨，向以厚积薄发著称。现在他能秉承师门之德，撰写出这样一部颇有见地的论著，我真诚地向他表示祝贺！期盼他持之以恒地提高自己的理论辨析能力，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上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是为序。

目 录

颇有见地的方言写作研究	畅广元(1)
引言	(1)
第一节 现代汉语·方言·普通话	(1)
第二节 汉语文学方言写作的历史渊源与发展现状	(11)
第三节 陈忠实方言写作实践的研究概况及意义	(22)
第一章 文化语境的变迁与陈忠实方言写作演变	(26)
第一节 1965 年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与强势政治话语周旋	(30)
第二节 “新时期”	
——“解放思想”文化语境中自发的方言创作	(50)
第三节 “后新时期”	
——多重文化语境交会中自觉的方言写作	(66)
第二章 陈忠实方言写作的动因	(78)
第一节 乡土依恋与方言情结	(78)
第二节 中国方言写作文学传统的影响	(89)
第三节 更新和改进“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需要	(104)

第三章 淘采语言的智慧

——陈忠实方言写作的策略	(116)
第一节 极富弹性的方言：形象化叙述	(116)
第二节 作为生活语言的方言：生命体验的展示	(141)
第三节 作为民间语言的方言：个人视野的民间立场 之表达	(155)
余论	(171)

附录 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陕西作家方言写作论

——以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为例	(174)
参考文献	(296)
后记	(303)

引　　言

本书研究陈忠实积极吸纳关中方言资源进行文学书写的小说创作实践，以及这一实践创造出的艺术辉煌。附论方言书写的路遥、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存在样态，以展示他们在方言运用上所表现出的“异量之美”。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有必要厘清方言与现代汉语、普通话之间的一般关系。

第一节 现代汉语·方言·普通话

《现代汉语》教科书一般都这样说：“汉语是汉民族使用的语言，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使用的语言。”^① 应该说，这是从狭义上定义“汉语”“现代汉语”。“汉语”之“汉”，有中华 56 个民族里“汉族”之义，在这个意义上，汉语就是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如同苗族人使用的共同语称“苗语”，壮族人使用的共同语称“壮语”一样。然而，自西汉以来，“汉”同时又兼有“汉人”即“中国人”义。“中国”一词，首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小序称“《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召穆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召公奭的后代。召公奭和周公旦协助周武王克商。立国后虽然各有封国，但周武王特

^①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二版）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 页。

准周、召二公各遣其长子去管理他们的封国，留周、召二公为左弼右辅，继续协助他管理各诸侯国。周、召二公次子的嫡长子，世袭周、召二公的左弼右辅的职位。西周自周武王兴至周幽王灭，共有 13 代天子（包括周厉王被放后代天子摄政的“共和”）。周厉王是第十代天子，则《民劳》是反映西周晚期王畿之地社会生活的诗篇。在《民劳》中，“中国”与“四方”对文。“四方”，指拱卫周京师及王畿的诸夏各个诸侯国；“中国”，则指周天子所定都的京师及王畿。“中国”一词，再见于《春秋》三传。在《春秋》三传里，“中国”经常与“夷狄”对文。“中国”，指诸夏所居的黄河中下游这片土地，以别于夷狄所居的“四裔”之地。自汉武帝遣张骞通西域，西域人称来自中土汉王朝的人为“汉人”。此后相沿成习，世界遂呼“中国人”为“汉人”。^① 汉朝时的“中国”，汉族人口是当时“中国”人口的主体。但当时“中国”的人口中，还有内附归化的其他民族人口。内附人口中，也有人转用汉语。例如汉武帝身边的宠臣金日磾和他的家族。在这个意义上，汉语，又是“汉人”即“中国人”使用的语言系统。现代汉语，是汉民族和“汉人”即“中国人”当下在口头和书面上使用的语言形式。

“现代汉语”是相对“古代汉语”而言的。“现代汉语”这个词组中的“现代”，有纯表“时段”意义的有别于“过去”和“将来”的“现在”义。其实，时间无始无终，浑然一体，人所体验的永远是“此刻”“此刻”“此刻”……根本没有什么“现在”“过去”和“将来”的“时段”之分。所谓的“现在”“过去”和“将来”，只不过是处身“此刻”的人，对根本就无法切割的时间，做出的人为切割：把“我”正体验着的“此刻”唤作“现在”，把“此刻”以前的时间唤作“过去”；把“此刻”以后的时间唤作“将来”。人虽然把浑然一

^① 文献可参考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分册第一四八条“汉人汉子”罗列的文献线索。按：尽管汉族是华夏民族的主体，但自西汉起，汉人是“中国人”的代称，并不专指汉族人。

体的时间人为地切割成“过去”“现在”和“将来”不同的时段，实际上，“过去”“将来”时段上的人，和“现在”时段上的人一样，也是恒处于“此刻”“此刻”“此刻”……之中。就像大河东去，从星宿海到入海口，九曲十八湾，虽然流经中国西北、中原、华北不同的地段，流淌的却是同一股水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同处在一个“共时性”的结构之中。

“现代汉语”这个词组中的“现代”，同时又蕴含有在政治经济学上有别于“古代”的“现代”义。政治经济学上的“现代”，乃是社会发展变革的结果，迥然有别于“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例如，民族国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科学精神，等等。由于政治经济学上的“现代”，有其可以确切辨识的标志性内涵，故而，尽管政治经济学上的“现代”，是从政治经济学上的“古代”的肌体上伸展出来的，且与“古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政治经济学上的“现代”，是有其清晰可辨的开端的。就中国而言，政治经济学上的“现代”，肇端于1911年追求“民族共和”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呼唤“德（Democracy，民主）、赛（Science，科学）二先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汉语”，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中起步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汉语”是汉语在中国“现代”这个“时代”的展开，是汉语“历时性”展开中的一个阶段。“‘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展开”，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原理》讨论到“语言”和“言语”的差异时，使用的一对概念：任何“语言”都具有“共时性”的结构；作为“共时性”结构的语言，在不同的时代“历时性”展开为不同时代的具体的“言语”，“言语”是“语言”活生生的现实。这对概念，给现代西方人文社科思想提供了思维新“范式”，引发了西方人文社科各个门类思维“范式”上的“语言学转向”。

“现代汉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步”这段因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现代汉语”在语言上的一般状况。

现代汉语包括汉语方言和普通话。

“方言”之“方”，是个空间概念——在康德的批判哲学里，空间和时间，即“方”和“时”，是既不属于“先验理性”，也不属于“实践理性”，却是让“先验理性”和“实践理性”成为可能的纯粹的“先验形式”。汉语“方言”，就是只在一个地方流行，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和汉语标准语有差异的汉语。汉语方言，是汉语在向四面八方“历时性”展开过程中形成的。而汉语方言之所以成为一“方”之“言”，是由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原因，它们程度不等地孤悬在主流汉语之外，“历时性”展开的速度，远远低于主流汉语“历时性”展开的速度，积年累月，就成了只在某一地域里流行的方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汉语方言就像是“汉语里的‘桃花源’”：由于“历时性”展开慢——“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故而，方言更多地保留有在主流汉语中已经流失的某些时段上汉语的原生态。《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十二章谈道“晋察冀根据地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人民充分发动起来了”时，提到平西大山里一个叫“野三坡”的地方：此地高山环绕，“形成一个独立的世界……一溜儿几十个村庄，过着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一直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一直到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才知道清朝已经灭亡了……当地人说：‘燕王扫北，都没来过这个地方。’清朝势力也始终没有到过这地方，这里的男人不剃头，女人不缠脚……”这里的制度、风俗、语言，一直停滞在明代，甚至更前。聂荣臻说：“像这样什么外人都没有进去过的地方，我们都进去了……经过深入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成为我们可靠的根据地。”^① 八路军进去之前的“野三坡”，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可以看作是汉语方言形成的一个缩影。

汉语方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汉语方言包括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两种。所谓社会方言，就是某一行业或某一组织内部的通用语。

^① 聂荣臻：《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326页。

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各有“勿使杂处”的居所，士恒居于“国”（又称“都”，用城墙围起来的行政中心所在地），农恒居于“野”（农耕作业区），工、商恒居于“肆”（在“都”中划定区域内，为官府提供供给服务的作坊和店铺），^①人被制度分割成一坨儿一坨儿的。汉以前，“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除了“士”败落后“降为皂隶”（杂役）之外，“四民”之间几乎没有流动的可能；唐以后，渐有松动。科举制的实施，为农家子弟身士大夫行列提供了通道。但能经过这一通道，“朝为田舍郎”而“暮登天子堂”者，只限于少数幸运儿。四民之间流动的空间，仍然不宽敞。故而三百六十行，经常有只在本行业内部流通而别的行业的人难得其要的“行话”。社会方言于是乎生。狭义的汉语方言，专指地域方言。所谓的地域方言，乃是汉语在各个地方的地域变体，《现代汉语词典》将“方言”定义为“一种语言，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定义的就是地域方言。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山川阻隔，人被自然环境分割成一片儿一片儿的，不同地域之间的人际交往受自然环境的限制，有难有易，汉语标准语对于不同地域语言的影响，也有浅有深。和外界交往密，受标准语影响深的地域，在语言上紧跟主流汉语；和外界交往难，受汉语标准语影响浅的地域，跟不上主流汉语的“历时性”延展，语言上更多地保持着自己的风貌，地域方言也就逐渐形成。进入“现代”，制度更新，科学发达，随着人克服自然限制的能力空前增强，人际交流的空间空前拓展，方言也随之发生着变异或更新。例如，由于士农工商“四民”制度的废除，现代人在各行业间快速流动，社会方言在萎缩中发生变异：“行业”对社会方言的影响逐渐式微；“亚文化族群”——例如“80后”“90后”“小白领”“飙车党”“网络

^① 《春秋谷梁传》卷十三《成公元年传》，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管子》卷八《小匡第二十》，（清）戴望纂《管子校正》，《诸子集成》第五册，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121页。

族”等——在社会方言更新上日趋活跃。再如，由于现代社会人口流动的速度和规模空前提高，异地谋生的人不同程度地采用标准语，标准语对地域方言的渗透力度空前提高，地域方言在异地谋生人那里，有向标准语趋同的趋势。但地域方言，仍然在地域方言诞生地顽强地流行着。

笔者所讨论的方言即地域意义上的方言。具体说，就是陈忠实在文学书写中积极调动的语言资源——关中方言。关中方言属于汉语十大方言区里“官方方言（北方方言）”区众多“次方言”里的一个“方言片”。

汉语方言或曰方言汉语在汉语“历时性”展开中形成的。根据方言调查之所得，依据一定的标准，可以从语音、词汇、语法大体趋同上，把众多汉语方言，归并成若干个不同“方言区”。中国现代方言学家对于现代汉语方言区，先后有五大方言、六大方言、七大方言、八大方言、九大方言、十大方言等不同的划分。现代汉语方言学对汉语方言区的划分呈现出一定的弹性，有其可以理解的缘由。汉语方言区的划分，建立在方言调查工作的基础之上。而方言调查工作的深入程度，有浅有深。例如，当“平话方言”——广西不少地区通行的不同于官话、白话、客家话的汉语方言，使用人自称为“平话”，尚未进入方言调查工作者的调查视野的时候——平话方言 20 世纪 80 年代才成为方言学界关注的热点，汉语方言至多能划分出九个方言区。汉语方言区的划分，是方言学家按一定的操作模式，对方言调查之所得进行的归并。方言学家进行归并时，使用的操作模式有差异，也可能使方言区的划分结果，出现可以理解的弹性。例如，当一些方言学家按自己选定的操作模式，判定晋方言只是北方方言里的一个“方言片”，不足以划分为单独的“方言区”的时候，汉语方言区就只有八个了。本书参照湖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06 年 9 月出版的第九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手册，将方言按地域分为十大方言区：官方方言（北方方言）、晋语方言、吴语方言、粤语方言、湘语方言、赣语方

言、闽语方言、徽语方言、客家方言、平话方言。十大方言区的划分，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社科院和澳大利亚人文学院共同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里的划分。我们既然已经注意到，汉语方言界对晋方言、平话方言够不够划分成独立的方言区，还存在有争议，为什么仍然认同十大方言区的划分？因为我们相信：科学发现是累积的。一般而言，后起的认识，要比先前的认识更完善些。方言区划分，是对已经调查到的方言，按某一标准，对一个个互相类似的被称为“次方言”的方言片进行的归并。随着方言调查工作的继续深入，方言片内部在语言上更细致的差异的发现，使“方言片”又可以再细分成若干个小方言片。如果小方言片中的各个地点方言差异仍然存在，还可以再细致地区分为若干个“点方言”。

在全国所有的地域方言里，有一种方言是各个方言区的人们基本上都能够听得懂的方言，就是基础方言。有史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中华民族一直在当时称作“中国”，后来称作“中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繁衍生息。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处现代中国的北方。在这片古称“中国”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各个族群，交往频繁，风俗趋同，语言趋同。随着“中国”的北绥南化，包括语言在内的“中国”文化渐次向南北扩散。驯致至今，北方方言覆盖的地域最宽，包括东北、华北、中原、西北、西南 2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分布地域大约占全国面积的 70%，使用的人口也最多，也占汉语人口的 70% 左右，其余九大方言的使用人口总和大约只占汉语人口的 30%。由于北方方言的一致性比较高，使用人口比使用其他方言的人口多得多，所以北方方言就成了汉语中的基础方言。至少自春秋时代起，汉语共同语都是从北方方言这个基础方言发展出来的。汉语共同语，在春秋时代叫作“雅言”，汉代称为“通语”，明清时代叫“官话”，民国时期又改称“国语”，新中国成立以后，称为“普通话”。

“普通话”是新中国在全国推广通用的汉语标准语。1955 年 10 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相继召开，从语

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确定了现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按此标准，制定出在全国通行的汉语标准语——“普通话”。1982年修改宪法时，将“推广普通话”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至此，普通话具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负责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政府职能部门，是“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

《辞海》2000年第1版这样定义“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不等于北方话或北京话，因为它还吸收其他方言以及古代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中的成分，比其他方言更丰富、更完善。”由此可见，“普通话”只是现代汉语的一种规范形态，并不直接就等于是“现代汉语”。例如，方言同样是“现代汉语”言语里活跃着的语言形式，普通话尽管可以吸收方言的某些语言成分，但涵盖不了方言的全部内容。“现代汉语”和“普通话”，是两个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明显差异的不同的概念。

然而，在日常生活里甚至在一些不太严谨的学术著述中，“现代汉语”和“普通话”，往往被不加区别地使用。这是因为人们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观念：“普通话”既然是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是国家明文推广的现代汉语，随着普通话向全国的推广，各地方言必然要向普通话趋同。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的将来时和归宿。题曰《现代汉语词典》的辞书，除了收有少数经白话文作家“雅化”因而和普通话有关的方言词汇，其实就是“普通话词典”，就是这种观念在辞书编纂中的反映。（按：新修订的第6版，在这个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然而，普通话负有规范“现代汉语”的使命是一回事，普通话能不能最终消融甚至取代方言却是另外一回事。从现实状况看，普通话推广给全国人民提供了一套超方言交流的共同语，但毕竟还未达到全面取代方言的地步。例如，各方言区的中小学学生，进课堂用普通话；课堂以外，还是习惯于用乡音交流。例如，出务工人员，在异地谋生学

着用普通话，以便更顺畅地融入异地社会；返乡，立即改用乡音。当然，也有外出务工的少男少女，返乡还说普通话。这当然是在“国家语委”里供职的工作人员最乐意看到的，但本土乡亲往往回讥笑他（她）们“撇洋腔”。可见方言在“现代”依然是“现代汉语”中的活跃因素，把普通话直接等同于现代汉语，以至于把方言排除在现代汉语之外的观点，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都是错误的。

“现代汉语”与“普通话”的主要差异在：“普通话”固然吸收许多方言的若干成分，但排斥的更多，方言里被普通话排斥的那一部分，依然活跃在“现代汉语”的“言语”里。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用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广普通话，方言运用呈现出明显的收缩趋势。例如，除个别少数民族地区保留有民族语广播电视台节目，保留有用民族语教学的学校，全国各地的广播电视台——港、澳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除外，一律用普通话播音，全国各地的学校，一律用普通话教学——教师使用普通话流畅不流畅是另一回事。中国人在现代，不分民族和地域，要接收信息，要获得知识，不通普通话是不可能的。但不管方言运用如何收缩，只要方言还在“言语”中流行，基础方言之外的九大方言与普通话明显不同的部分，包括它们与普通话之间在语音、语法和词汇方面的差别，仍将长期存在于现代汉语中。这就造成“国内双语并存”局面。大多数当代中国人，在家庭、乡邻之间的私人场合说着方言汉语，而在学校、社会等公共场合说着普通话。方言是家庭、乡土或区域语言，普通话是学校、社会语言。现代汉语“言语”过程中普通话和方言“双语并存”的局面，是以“在全国推广普通话”为职能的“国家语委”不乐意看到的，但它给中国现代作家文学书写中的语言选择，提供了可以回旋的空间。

一种成熟的语言，在口头使用的语言形式之外，还有与之相配合的文字书写系统。现代汉语通用的文字书写系统，称作“现代白话文”。“现代白话文”，是相对“古代文言文”而言的。“白话”就是口头语。“白话文”，就是以汉语通用的口头语为语言基础的文字书写